



## 20世纪后期大陆的荀子文献整理研究

(2007-8-13 6:11:16)

作者：廖名春 转载于：<http://www.confucius2000.com/>

之误”（《荀子译注·附录》，第692页）。笔者认为张觉的意见有道理。从文字来看，浙北本的错误更少。其残缺部分可据《古逸丛书》本补足。因此，校勘《荀子》，以浙北本为底本当更嘉。（此处文字有缺失）

骆瑞鹤的《荀子补正》（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是一部类似王念孙《读书杂志·荀子杂志》的著作。该书对《荀子》32篇及其各家之说进行补正校释，共有笱记285条。其体例为：先以大字顶格列出正文，再另起一行低一格列出所补正的各家之说，然后另起一行以“按”出以己见。如无各家之说，则在正文后直接出以己见。其融辨析字形、订正音读、说解意义为一体，无论是纠正前贤时人的讹误，还是出以新说，都是专攻难点，专打硬仗。其基本准则有三：一是看是否符合校勘学、训诂学规范，二是看是否符合原文原义，三是看是否符合史实。可以说笱记285条，条条都是心得，都是反复斟酌之作。堪称大陆50多年来《荀子》考释订正的标志性成果。当然，此书也有一些可讨论之处。王天海指出了几条，大都言之成理，可以参考。

李中生的《荀子校诂丛稿》（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是作者1991年至1998年《荀子》校释论文的汇集，共收论文11篇，约22万字。其《读〈荀子〉札记》一篇有校释笱记250条，发明甚多。其论杨倞《注》、王先谦《集解》、王念孙《杂志》、梁启雄《简释》的诸篇，在荀学研究史上，意义尤深。李氏认为：清以来的注家有两个较为普遍的缺陷。一是重训诂而轻义理。二是只注意由字词到句，然后到全篇之义、全书之旨的一面，忽视了由全书、全篇之义旨及用词特点到某句、某字词的另一面。对王念孙《杂志》、王先谦《集解》得失的检讨，就是从这一观念展开的。这一认识，在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上算不得新鲜，但在《荀子》校释方法的讨论上，却属少见，有纠偏之功。对清人，特别是后来的梁启雄《简释》轻易校改《荀子》，李氏既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又分析了其误校、误改的方法论原因：在利用本篇前后文字进行论证时，忽略了还需从整部书的义理和用词造句来融会贯通；在利用他书或类书的引用来比勘时，忽略了他书或类书的引文也会有省改的情况；在利用古注来改动原文时，忽略了古注与原文所存在的一些特殊对应关系；在利用古人行文的常规句法进行校对时，忽略了古人行文的文句异例。这些分析，是实事求是的；而其具体的校释工作，也大多是成功的。他与骆瑞鹤，可以说是大陆50多年来《荀子》训诂考释工作的双子星座。

### 三 校勘考释杂论

50多年来，尽管没有《荀子》研究的专著，但高亨、金德建、包遵信、王天海诸位在《荀子》校勘考释方面也颇有成果。

高亨1933年就写成了《荀子新笱》，当时梁启雄著《荀子束释》就曾借阅并选录了若干条。后来高氏也有些增补，1957年略予删修，刊登于当年的《山东大学学报》第9期。1961年收入《诸子新笱》一书，笱记共94条。高氏乃训诂名家，在《荀子》字词的校释、训诂上也新见迭出，斩获颇丰。比如其释《劝学》篇“金就砺则利”云：“砺乃厉之俗字。《说文》：‘厉，旱石也。’《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泰山若厉。’集解引应劭曰：‘厉，砥石也。’是厉之本义为磨刀剑之石。‘金就砺’者，谓刀剑之属，就砥石而磨之也。此二句相对成文。绳为正木所用之物，砺为砥金所用之物。砺亦有磨义，但不可以解此文。”（高亨：《诸子新笱》，第141页）这是以本字释后起孳衍字。高氏之说，证据充分，又经长期斟酌，较为审慎，大多能成铁案。如《非相》篇“故长短小大善恶形相，非吉凶也”句，梁启雄《荀子简释》曾引高氏旧说，云：“善恶当为‘美恶’，字之误也。”（梁启雄：《荀子简释》，第47页）不过，在1961年版《诸子新笱》的《荀子新笱》里，此条就被删去了。这是正确的。先秦文献里大多以“美

恶”相对，但也不乏“善恶”相对的例子，如《国语·晋语八》：“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恶人在位，不去亦不祥。”《荀子·强国》：“夫尚贤使能，赏有功，罚有罪，非独一人为之也，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恶恶之应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性恶》篇善恶相对之处则更突出。包遵信指出：善也有美训。所以，不能因为美恶习见就否定善恶相对。高氏《荀子新笺》删去旧说是高明的。当然，以偏概全，好改原文是清代以来朴学家的通病，高氏也不能尽免。

金德建的《荀子》研究成果集中在《先秦诸子杂考》（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年）一书里。该书第二十一章《诸子丛考》有“《荀子·强国篇》有后人窜入”节，第二十二章《诸子丛考续》有“陈仲、史鳅遗说考”节、“《荀子·非十二子篇》与《韩诗外传·非十子节》之比较”节，第二十三章《诸子学丛论》有“《非十二子篇》舜、禹节疏释”节，第二十四章《〈尸子·广泽篇〉零笺》有“《尸子·广泽篇》与《荀子·解蔽篇》宗旨相通”节。第二十六章《〈荀子〉零笺》、第二十七章《〈荀子〉零笺续》、第二十八章《〈荀子〉零笺再续》更是《荀子》的专论，考辨了《荀子·非十二子》、《儒效》、《解蔽》、《不苟》、《天论》、《王霸》、《正论》、《强国》、《君道》、《王制》等篇的诸多问题，颇得学界瞩目。其中有些内容1950年以前就曾发表过，1950年以后在大陆刊物上发表的则似乎只有《〈荀子〉零笺》（《中华文史论丛》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一种。金氏的研究以“辨章学术，考证源流”为主，但也有订正文字者。如其论《荀子·非十二子篇》的“它器”即秦相“范雎”形讹之说，很有影响。记得80年代我读研究生时，李德永教授给我们上《荀子》研究课，就曾大加赞赏。当然，这也有大胆假设有余而小心求证不足的嫌疑。

包遵信是“四人帮”被打倒后重评《荀子》的代表。其在大陆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虽只有《论荀况宇宙观的形而上学特征》（《历史研究》1977年4期）、《读〈荀子〉札记(上)》（《文史》第5辑，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12月）、《读〈荀子〉札记(下)》（《文史》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6月）3篇，却很有影响。《读〈荀子〉札记》上、下两篇有校释文184条，发明颇多。后来大陆的《荀子》考释，立说无不以其为基础。董治安和郑杰文的《荀子汇校汇注》于今人之作绝少收录，除其师高亨《荀子新笺》外，实质上仅取了包遵信《读〈荀子〉札记》一文，可见其份量。对包文的问题，骆瑞鹤、李中生、王天海、李亚明的论作都有一定涉及。不严谨处，笔者偶尔也有见。如开篇第一条批评高亨“善恶当为‘美恶’，字之误也”说，实即高亨早年旧作，在后来出版的《新笺》里，早已删去。包氏视而不见，当属不妥。

王天海近年有《〈荀子·劝学篇〉校释订补四则》（《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2年6期）、《〈荀子·修身篇〉校释订补五则》（《贵州文史丛刊》，2003年2期）、《〈荀子·不苟篇〉疑词新证》（《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3年6期）、《〈荀子·修身篇〉句读新辨二则》（《贵州文史丛刊》，2004年3期）、《〈荀子·荣辱篇〉疑词新考》（《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4年4期）、《〈荀子〉校勘注释源流考》（《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5年5期）等一系列力作发表，学风规范，视野开阔，考辨精细而富有创见。《〈荀子〉校勘注释源流考》评论各家《荀子》校勘注释之作，持论公平而独具法眼。论荀学史的专著如马积高的《荀学源流》、江心力的《20世纪前期的荀学研究》与其比较，高下判然。至于非荀学史研究博士生的文献综述在材料的占有和评判上难以与其比肩，就更清楚了。不过，从发表的论文看，王氏的校释考证工作仍集中在《荀子》的头4篇，《非相》以下28篇尚未完成，可谓任重而道远。

## 余 论

总的来说，这50年来中国大陆尽管出版了40多部《荀子》的注释、注译著作，但仍没有一部能与王先谦《荀子集解》比肩的注本。到现在为止，100多年过去了，王先谦《荀子集解》仍是最好的注本。今天，深入研究《荀子》，我们迫切需要一部全面超过《荀子集解》的《荀子》新注。这部新注，首先需要选好底本，我们无论是选《古逸丛书》本还是南宋浙北刻本，都比所谓“不主一本，择善而从”要好，也比王先谦《荀子集解》选择卢校谢刻本为底本要好。高正、王天海推崇《古逸丛书》本而贬南宋浙北刻本；张觉尽管推崇南宋浙北刻本而贬《古逸丛书》本，但其《荀子译注》仍用《荀子集解》初刻本为底本，这是其《译注》的通俗性所致。笔者认为浙北本虽残缺了10来页，但由于其为“今存《荀子》刻本之最古者”，文字错误较之《古逸丛书》本更少，当为上上之选。其次，广为搜集前贤今人的解释考订成果，既要《荀子集解》遗漏的前贤之说一一补齐，又要将《荀子集解》以后的今人之说尽可能地

竭泽而渔，一网打尽。不但要注意专书，更要重视单篇论文；不但要注意汉字文献，也要重视非汉字文献。第三，在广集各家之说的基础上，考据与义理相结合，得出最后的考释意见，力争优胜劣汰，优选出或创造出最佳方案。21世纪的《荀子》文献整理研究，最应该做的就是这一工作。

(注：原载于《中国思想史通讯》2006年第1辑)

[\[第 1 页\]](#)

[\[第 2 页\]](#)

[\[第 3 页\]](#)

[\[关闭窗口\]](#)